

永觉元贤《鼓山志》及其文献价值

纪华传

元贤是清初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气节的禅僧，他的《鼓山志》在清初编纂刊印以后，一直没有广为流通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仅有存目，未收全书，国家图书馆等处所收藏的此书均为残本。本文依据的《鼓山志》现藏于世界宗教研究所，为品相极佳的足本，最早被清初藏书家汪宪收藏，乾隆修《四库全书》时呈于朝廷，又辗转藏于八千卷楼、江苏省图书馆，后流传至民间。该书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，内中题记、钤印等亦极为珍贵。本文还考察了历代编修的鼓山寺志的内容和存佚情况，对元贤的流传和撰述时间进行了考证，并在标点校勘该书的基础上，与黄任的《鼓山志》的内容加以比较，指出元贤所编的《鼓山志》从内容、特色以及版本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：明清佛教 永觉元贤 《鼓山志》 禅宗文献

作者纪华传，1970年生，哲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鼓山是佛教名山。在盛唐以前并不被地理史学家所重视，直到建寺以后，其景色秀丽才为世人所知，而且因其高僧辈出而名闻于天下，鼓山涌泉禅寺被尊为“闽刹之冠”。鼓山寺之创建，始于唐建中四年（783）。僧人灵峤应从事裴胄之请，诵《华严经》于此，降服毒龙，于龙潭旁建华严寺。梁开平二年（908），闽王审知填其潭为寺，请僧雪峰义存的弟子神晏住持。此后千余年来，该寺一直为禅宗名刹，神晏因此被尊为开山第一代祖师。宋真宗咸平二年（999），赐额“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”。明永乐五年（1407），住持善缘了心禅师应诏入京说法，轰动一时，深得皇帝恩崇，于是升院为寺。清代的康熙皇帝又御题匾额“涌泉寺”。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与乾隆七年（1742）朝廷两次颁赐藏经。明末清初无异元来、永觉元贤等住持鼓山涌泉寺，大扬曹洞禅风。此后，元贤的弟子为霖道霈承继其法，并经门人惟静道安、恒涛大心至遍照兴隆等，形成曹洞宗之“鼓山系”。清代曹洞宗有寿昌系和云门系两派，以寿昌系势力最大；而寿昌系三个支派博山系、鼓山系和东苑系之中，又以鼓山系影响最大，一直传承、影响至近代的虚云和圆瑛两位佛教高僧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由于明清时期鼓山为我国重要的佛经刻印和流通场所，以刊刻精美而为世人推重。鼓山刻本很多都是作者亲自主持刊刻，讹误甚少，极具版本价值。本文研究所依据的永觉元贤《鼓山志》为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的采进本，这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善本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一、鼓山历代寺志的修纂

明清两代，善缘了心、谢肇淛和徐火字、永觉元贤、黄任、陈祚康等曾经先后五次编修鼓山志书，下面首先对五个版本的鼓山志书的内容和流传、存佚情况略作考释。

第一种，善缘了心（？—1431）编集的《灵源集》，久已佚失，现仅存《灵源集序》。据此序所载，《灵源集》成书于明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，主要是“集古今名公巨卿登览之所题咏”^①。灵源洞位于涌泉寺东，两壁陡峭高耸，中间幽静深邃的峡谷因酷似山洞而得名。灵源洞以摩崖石刻而著称，如宋代的蔡襄、陈襄、李纲、赵汝愚、朱熹等人的石刻皆镌于此。观本《涌泉禅寺经版目录》云：“此书乃记载鼓山前代老宿之事实，及名人文艺等，为鼓山志之权舆。当时黄用中、徐兴公等编《鼓山志》即本于此。”^②《灵源集》即是编集石刻诗文及有关鼓山的文字记载而成。《灵源集序》曾叙此书编集之缘起：“然历年既久，诗文浩瀚，有已刻于石者，则苔封藓侵，观者艰于览诵。有未刻于石者，时移人换，久而散佚失传。故予不揣，并而集之，名曰《灵源集》，亦使后人之后题咏续此源源而不绝也。”^③据此可知，《灵源集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山志，仅为诗文汇编，所以元贤批评它“序列无纪，采录亦疏”。但是《灵源集》保存了有关鼓山的大量文献材料，为后世编纂鼓山志奠定了基础，依然功不可没。

第二，谢肇淛、徐火字的《鼓山志》，十二卷三册，撰于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。《明史》“艺文志”中载：“谢肇淛《支提山志》七卷，《鼓山志》十二卷。”^④元贤《鼓山志序》载：“至万历戊申，郡绅谢在杭同布衣徐兴公再为纂辑，则纲举目张，井然有纪，旁搜远揽，纤悉靡遗，大有功于是山者也。”^⑤此山志结构合理，内容已初具规模，分为“胜迹”、“建置”、“田赋”、“物产”、“沙门”、“贞珉”、“艺文”等共七类，为后修的山志之圭臬。此志除了记载当时鼓山寺院田产的田赋志外，其主要内容均为后修的山志所吸收。此书现存于福建省图书馆、日本内阁文库等处。

第三，永觉元贤（1578—1657）于清初顺治年间再次续修的《鼓山志》，亦为十二卷，共四册。在《清史稿》“艺文志”中对元贤的志也加以著录，称“《鼓山志》十二卷，僧元贤撰。”内容包括六个方面：卷一“胜迹志”，卷二“建置志”，卷三“开士志”，卷四“贞珉志”，卷五至卷十一“艺文志”，卷十二“丛谈志”。相对万历刊本《鼓山志》，此书无“田赋志”，因元贤之时，寺院田产已荡然不存，所以不载。^⑥至此，《鼓山志》内容结构更趋完备。兴隆禅师曾评价此书说：“国初，永觉老人以真儒度

^① 元贤：《鼓山志》第2册，鼓山涌泉寺顺治初刻本，第13页。

^② 观本：《涌泉禅寺经版目录》，“鼓山禅德遗著佚目”，鼓山涌泉寺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刻本，第48页。

^③ 元贤：《鼓山志》，第2册，第13页。

^④ 《明史》卷78，“艺文志”第74。

^⑤ 元贤：《鼓山志》，第1册，第1—3页。

^⑥ 元贤：《鼓山志·凡例》云：“寺田产半入学宫，半归豪右，今无存，故不载。”

世，复承徐兴公以续稿见付，志乃大备。”^①

第四，黄任（1683—1786）于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应鼓山住持遍照兴隆之请增修的《鼓山志》，十四卷，共六册。此本流传最广，现存的经版是光绪二年（1876）鼓山住持奇量补刻。此志是在元贤旧志的基础上，增补从元贤至兴隆百年间鼓山新的内容。卷首冠以图，分为八门，除增加“田赋”一门外，其余七门开合与前志略有差异，其八门依次为名胜、寺院、古迹、沙门、田赋、石刻、艺文、外纪。

第五，陈祚康《续修鼓山志》稿本（收录广陵书社《中国佛寺志丛刊》第99册），成书于道光年间。此书为残本，未知其全貌。但由于该稿保存了乾隆至道光年间部分重要艺文及历代住持情况，所以仍有一定的价值。

在这五种志书中，以黄任本流传最广，至今鼓山仍存此版，并有刷印流通。由于元贤是具有明遗民倾向的曹洞宗僧人，《鼓山志》编于清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清修《四库全书》仅有存目，未收全书。现在国家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所收藏的鼓山志均为残本，《四库存目全书》收录了此书，然而影印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藏本，首册残缺。笔者所见的此书为全本，是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的采进本，弥足珍贵。与黄任本相比，永觉元贤纂修的《鼓山志》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刊刻质量都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，而且此志书一直没有广为流通，所以本文着重对此书文献价值加以分析。

二、永觉元贤与《鼓山志》

元贤（1578—1657），字永觉。福建建阳人，俗姓蔡，初名懋德，字闇修，为宋代大儒蔡元定的十四世孙。幼年习儒，推崇周敦颐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人的理学。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在山中的寺院读书时，因听到有人诵《法华经》中的偈颂：“我尔时为现，清净光明身”，欢喜不已，认为“周孔外乃别有此一大事”，于是开始钻研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和《圆觉经》等大乘经典。第二年，前往福建董岩，随无明慧经（1548—1618）习禅。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父母去世后正式出家。慧经是明末著名的禅僧，与绍兴云门显庆寺的湛然圆澄（1561—1626）并称为当时曹洞宗的两大宗匠，分别形成了曹洞宗寿昌系和云门系两大禅系。一年后慧经去世，又往信州（江西上饶）博山能仁寺参无异元来，并受具足戒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元贤返回闽中，住沙县双髻峰。次年九月，居瓯宁县（今福建建瓯市）金仙庵，闭门阅读大藏经三年。崇祯七年（1634），元贤住持福州鼓山涌泉寺，翌年往泉州真寂禅院和南剑州（今福建南平市）宝善庵。十五年（1642年）再度移锡泉州开元寺，后返福州鼓山，前后住持鼓山23年，使鼓山终成“八闽丛林之冠”。元贤及其门下所形成的曹洞宗“鼓山系”在整个有清一代都非常兴盛，该系的法脉传承字号有二十字：“慧远道大兴，法界一鼎新，通天并彻地，耀古复

^① 兴隆：《鼓山志序》，黄任：《鼓山志》第1册，鼓山涌泉寺光绪二年（1876）补刻本，第2页。

腾今。”^①

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中，元贤与其他多数曹洞宗僧人一样，多具有强烈的反清倾向，然而在他的传记中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多隐而不提，只是讲到在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春天时，兴化、福清、长乐一带遭遇战乱，饥民甚众，他率僧众设粥赈济，又以棺葬死者二千余人，历时五十天。他因此受僧俗推崇，慕名问道或求戒者络绎不绝，“山中所依止率三百余人，问道受戒，不啻数万人”^②。在清初以学问和气节为世人所推重的李世熊（1602-1686年）在《史感》中曾记载：“吾闽永觉禅师初得旨于寿昌，后于鼓山开堂。及闽关不守，师掩扉撤座，竟不上堂拈香。盖释门中又自有真忠孝、真节义，万万非儒生所及者。”^③“上堂拈香”为禅门用语，通常于开堂说法之前，拈香祝皇帝万岁，称之“祝圣拈香”。若应请担任住持在初次上堂说法时，除祝圣拈香外，还要为自己得法本师拈香，表明自己的法脉师承，以报答传法禅师的法乳之恩。元贤于满清攻陷福建后，掩关撤座而不上堂拈香说法，显然是不愿意为新朝皇帝祝寿。所以被李世熊尊之为释门中“真忠孝、真节义”者。另外，在魏杰《建立五贤祠序》中还保留了元贤的一句诗：“满朝袍笏迎新主，一领袈裟哭旧王”，^④这句诗同样反映出元贤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气节。

关于元贤的《鼓山志》的记载，在《清史稿》“艺文志”中有著录，称“《鼓山志》十二卷，僧元贤撰。”^⑤由于元贤在清初时的反清倾向，故清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未收此书，仅在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中称：

《鼓山志》十二卷（两淮盐政采进本），国朝僧元贤撰。其序不标年月，书中记事至顺治壬辰、癸巳，则国初人也。鼓山在福州城东三十里。是书分《胜迹》、《建置》、《开士》、《贞珉》、《艺文》、《丛谈》六门。大旨以佛刹为主，名为山志，实则寺志耳。其凡例有云，兹山知名海内者，实以人重，非以形胜重也。缙徒妄自标置，可谓不知分量者矣。^⑥

《提要》虽未分析和批评此书刊于清初却未标年月的动因，但藉凡例中“实以人重，非以形胜重”一语痛加斥责，认为元贤“妄自标置”、“不知分量”，反感之情溢于言表，这实际是借贬抑其著书而对元贤加以攻击，所以此书未被收录到《四库全书》中自然也是可以理解了。

由于清朝政府对元贤的反感态度直接影响了此书的流传。现在国家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和厦门大学图书馆等所收藏的鼓山志均为残本。当初修《四库全书》时两淮盐政的采进本很长时间以来亦不知去向。幸鼓山涌泉寺发心整理鼓山历代祖师的著作，有编

^① 觉苑禅慧：《觉力禅师传承源流考》，《觉力禅师年谱》，（台湾）大湖法云禅寺、旃檀林师子会倡印，1981年，第172页。

^② 潘晋台：《鼓山永觉老人传》，《永觉和尚广录》卷30，《已新纂续藏经》第72册，第580页。

^③ 李世熊：《史感》，民国七年（1928）活字本，第28页。

^④ 魏杰：《建立五贤祠序》，《鼓山艺文志》，海风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583页。

^⑤ 《清史稿》卷146，“艺文志”第121。

^⑥ 《四库总目提要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纂《鼓山法藏》之盛举，经多方搜寻与师友的帮助，笔者得以亲睹此沉寂 350 余年的绝世善本，无任欢喜！该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，原系近代著名藏书家赵钊所珍藏。赵钊（1905-1984）字元方，世居北京，喜好收藏典籍，藏书室名“无悔斋”，所藏多珍稀善本。世界宗教所收藏的这部《鼓山志》以及其他一批善本古籍，均为 1980 年前后从赵老先生手中所购买。

根据最后一册封面赵钊（署名无悔）的题记称：“此八千卷楼藏本，后陈江苏图书馆，乱后流出，以其有汪鱼亭印，故收之。无悔。”八千卷楼为丁丙藏书楼，丁丙（1832-1899）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，在他的藏书中颇多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底本。《八千卷楼书目》中著录了《鼓山志》，并说是“国朝释元贤著，原刊本”。汪鱼亭即汪宪（1721-1771），字千陂，号鱼亭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清初著名藏书家，其藏书之所称“振绮堂”。乾隆修《四库全书》时诏求各地藏书，汪宪的长子汪汝溧呈振绮堂所藏秘籍 300 余种，因此受到朝廷嘉奖。^①据此可知，笔者所见元贤《鼓山志》应该是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的采进本。根据题记可知，此书原被著名的藏书家汪鱼亭收藏，清末藏于以珍藏《四库全书》善本书而著称的八千卷楼，而后这批古籍陈列于江苏省图书馆，后又辗转流传至民间。此书第一册封面右上角有朱笔“地理类”、“史”等字样，首页（《鼓山志序》）中除了“曾在赵元方家”印外，还有“汪鱼亭藏阅书”、“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”、“四库墩（附）存”等朱印。这亦可印证赵钊的说法。

关于此书的撰述时间，由于元贤不满于清朝的统治，故于序中未署“大清”或“国朝”的年号，这对于研究其成书时间带来不少困难。根据上述元贤《鼓山志序》记载，谢、徐的志撰于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而元贤的序作于 46 年之后，即为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。此外，在元贤的志中，顺治的年号出现 11 次，其余十次均在顺治八年至十年之间，即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中所说的“书中记事至顺治壬辰、癸巳”，只有在卷二中有一处记载：“吸江兰若，在舍利窟。顺治乙未冬，僧成源，同信士罗等法建”，顺治乙未即为十二年（1655），可能是成书以后在刻印时所增添的内容。综合元贤的序及正文中的内容推断，元贤《鼓山志》应编纂于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。

三、元贤《鼓山志》内容及特色

元贤《鼓山志》共十二卷，卷一“胜迹志”，载鼓山风景名胜；卷二“建置志”，包括寺宇、支院、桥亭、祖塔等内容；卷三“开士志”，为鼓山传灯弘法的历代住持祖师；卷四“贞珉志”，载鼓山摩崖石刻，除诗并入艺文志中；卷五至卷十一“艺文志”，包括碑、序、记、疏、塔铭、赋、铭、诗等内容；卷十二“丛谈志”，采撷诸书所记鼓山的奇闻轶事。乾隆刊本《鼓山志》共十四卷，是在前志的基础上，增补从元贤至兴隆百年间鼓山新的内容。笔者通过认真标点校勘元贤本《鼓山志》，发现它与现在流通的

^① 参见郑伟章：《文献家通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 年。

黄任本《鼓山志》相比多有胜处。

首先,从内容上看,两志中每一部分之前均有一篇“志”,概括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与作者的编辑宗旨;在每一部分之后都有一篇“论”,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加以引申和总结。这两方面的内容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志书的特色,体现出志书的重要文献价值。由于永觉元贤为宗门尊宿、禅门祖师,而黄任则为硕学之士、儒门大家,从两志每一门的“志”与“论”可以看出,二者的编辑旨趣略有差异,可谓相互辉映,相得益彰。如元贤《鼓山志》卷三“开士志”的“论”中谈及鼓山古来往持盛德时说:“故古之名贤如张德远、李伯纪、赵子直、朱晦庵辈,皆能降心折节,相访于深林僻谷之中,非以其人有足重者乎!”而黄任在“沙门”篇中的“论”中则说:“昔刘屏山语朱子云:吾少官甫田,以疾病时接佛老之徒,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,而心悦之。比归,读儒书,而后知吾道之大,体用之全乃如此。君子之不囿于方而识所决择,若是也。”一僧一儒,所处的立场不同,所以在论及士大夫倾心于佛教时各有特色。又,元贤在所撰的《鼓山志》中,表现出对佛教盛衰强烈的忧患意识,如“贞珉志”,在论及鼓山摩崖石刻时,对涌泉寺的兴废产生无限之感慨:“昔涌泉之盛也,飞甍峻宇,已极人间之巨丽,犹赖有德者居之,庶可持盈而不坠。厥后以凉德处盛极之势,如之何不至湮没乎?故虽以列祖之德,闽王之威,而曾不能与樵竖之火格数也,亦理也。”

其次,关于元贤《鼓山志》所载的鼓山涌泉寺历代住持,对于研究鼓山禅宗法脉传承具有重要价值。在不同版本的《鼓山志》中,所记载的鼓山历代住持多有差异,然由于资料阙如,以往多未引起注意。近代虚云在《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序》中曾指出:

《联芳集》一卷,为本山第十三代住持宋庆麟禅师创始,三十七代孤峰惠深禅师继之。孤峰,宋绍兴中住持。今刊本及于明正统中简翁禅师,则不知谁所继辑。简翁至今,又四百余年矣,其间住持已五六十易,《山志》所纪,止于清乾隆遍照禅师,以下则无纪载。明以前《联芳》与《山志》所纪,间有异同,使年更久,益莫衷其是。前此住持,皆不顾虑及此,余常惄然忧之。^①

《山志》即为黄任编修的《鼓山志》。虚云禅师有感于此,故有增订《鼓山列祖联芳集》之举,“乃始取《山志》与《联芳集》二本参证,以别集一一正之。乾隆以前之住持,历略折二本而增削之,庶就于简明。乾隆以后,则本于碑记、万年簿,及故老遗闻,可采者纪之,其无徵者,或存名而阙史,昭其实也。”^②由于虚云禅师主要依据黄任《鼓山志》和《鼓山列祖联芳集》的记载,而未获睹见元贤的《鼓山志》及前述道光年间陈祚康《续修鼓山志》稿本,虽然订正了部分错误,但仍然有所缺憾。例如,从第一代神晏国师到第二十二代木蛇禅师,各书所载均相同。然从二十三开始,各本之间差别很大。元贤《鼓山志》“凡例”中说:“兹山知名海内者实以人重,非以形胜重也。历代住持,今择其尤者各为立传。永乐之后,住持德不称位,悉削去。”^③所以元贤的志

^① 虚云:《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》,鼓山刻本,1936年重印版。

^② 同上。

^③ 元贤:《鼓山志》,“凡例”,第1册。

是根据实际住持的顺序加以记载，遇有不称职的则阙载，如二十三代，以及四十二至四十四代、五十八代至六十三代、六十六代至六十七代、六十九代至七十四代、七十七代，以及无异元来之前的十五代，共有三十四代都没有记载。但黄任的志则径以二十四代竹庵士珪禅师作二十三代，其他所阙的住持不加任何说明而将各代连续记载。对此，虚云老和尚在增订《鼓山列祖联芳集》中已发现此问题：

《联芳集》此下四十二至四十三代，不著祖名。有附记云：“自绍定己丑至嘉熙丁酉，凡九载，历任住持三代，以祖堂既因火废，而《列祖录》又脱去二枚，故阙。”按《灵源集》中有宋邓肃《别鼓山珠公诗》，姑识之，以俟再考。《鼓山志》则不著痕迹，自四十一代枯禅二师下，直得《联芳集》所列之四十五代之广慧禅师，为四十一代。以理例论，则山志之断代直续，实非为是。然代远年湮，其三代之阙名无从查考。姑依山志直续数系，而两志其因缘如右。^①

虚云老和尚共增补了三十一代，但是四十二至四十三代却依然文献无徵而付阙如，不得已还是和黄任的《鼓山志》一样，直续其代数。元贤《鼓山志》虽然部分名不称位的住持没有立传，但是却忠实地记载了各代传承的情况，说明其著述是很严谨的，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鼓山的法脉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四、元贤《鼓山志》的版本与校勘价值

由于黄任新修《鼓山志》为至今尚在刷印流通的版本，通过与元贤旧志的比较并认识其不足，可以为以后重修《鼓山志》提供参考。下面从版本校勘的角度进一步对顺治刊本《鼓山志》的价值作以探讨。

第一，顺治刊本收录的内容有的未为乾隆刊本所收。例如，前述《鼓山列祖联芳集》是宋代鼓山住持庆麟撰述，明代孤峰惠深禅师继修，近代虚云老和尚又加以修订增补，是为《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》。《列祖联芳集》今已不存，元贤《鼓山志》收录有庆麟的序文，却未被后来黄任的新志所收。后者仅收录明代惠深的《列祖联芳集后序》，内容与元贤的志所收的相同。通常情况，后来递修的山志应该尽量吸取前志的内容，况且《列祖联芳集》为鼓山记载鼓山历代祖师传承的重要著作，黄任的新志未收此书的序，不能不说是其疏漏。元贤《鼓山志》所载《列祖联芳集序》云：

圣宋皇佑二年庚寅岁仲春，余自万安归故山。越明年暮春，有知兴化军屯田俞公，假道福唐来游是院，予因迎见之。及坐，公辄问曰：“鼓山开牀于今有年，累世子孙升堂嗣续，星岁始末，其有录乎？”予对曰：“往世难于稽考，近事尚可访问。”公笑曰：“传家之谱，何可阙欤？盍亦采而集之。”予退而讨诸旧志，询诸耆年，得当代宗师法要行实，存诸别录。此则但记其住持初终，联灯继业，总成一集，寘于开山国师真堂，俾司是堂者递相传世，毋堕前事。后之住持，当继岁月，

^① 虚云：《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》，第10页。

为列于后。^①

第二，两本均有收录，但内容又所差异。如《灵源集》为鼓山最早编纂的山志，是鼓山住持善缘于明永乐三年至六年之间（1405—1408）成书，惜久已佚失。两书均收录《灵源集序》，但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别：

元贤《鼓山志》	黄任《鼓山志》
灵源乃鼓山之洞名，洞何为而有集也？盖集古今名公巨卿登览之所题咏也。鼓山之名，唐以前不甚著，始自唐初，有彩凤来浴于大顶之池，郡人以为瑞故，城中立凤池，扁以应之。又有白龙潜于岩崩之下，维时神僧灵峤者颂《华严》于石上，其龙听法遂舍去，因建华严寺，寻废。至梁开平二年，闽王审知复创寺，赐名涌泉。开山者，神晏国师也。	灵源乃石鼓山之洞名，何为而有集也？盖集古今名公巨卿、文人墨客登览之所题咏也。然而鼓山大刹创自梁开平二年，迄今五百余岁矣。檀越者谁？王审知也。开山者谁？神晏国师也。若其山之灵异，亦有可言者焉。始有彩凤来浴于大顶之地，而池面郡治，使郡人无燹火之虞，故郡人立凤池匾于郡城中以应之。又有白龙潜于岩崩下之潭，维时神僧灵峤者阅《华严》于石上，其龙听法遂舍去，因斯祥而辟斯寺。
其寺之栋宇翬飞，金碧交映，乔松苍桧，烟云缭绕，隐然若耆崛之境。	其寺之栋宇翬飞，金碧交映，乔松苍桧，烟云缭绕，隐然蓬莱仙境也。
寺之右由石径，陟于石门诣普贤境界亭，度松关亭。松关下一里许，庵曰圆通。少曲数百武有半山亭。	寺之右皆石径，陟于石门诸普贤境界，度松关亭。（以下十九字无。）

从二者所收的内容看，前者文字精炼，且叙事清楚明了，而后者则用语粗浅，叙事冗长。如前者载：“至梁开平二年，闽王审知复创寺，赐名涌泉。开山者，神晏国师也。”而后者则作：“然而鼓山大刹创自梁开平二年，迄今五百余岁矣。檀越者谁？王审知也。开山者谁？神晏国师也。”又前者中“彩凤来浴”、“神僧灵峤”诵《华严经》降服白龙，以及神晏国师开山，按时间顺序叙述清晰。然后者则现书神晏开山，后记灵峤创寺，不符历史事实，显然属于编者或刊刻时错乱所致。

第三，从雕版印刷来看，元贤的《鼓山志》刊刻精美，文字校勘审慎，而黄任本则雕板、印刷以及文字均有很多错误。如元贤志卷三载：“二十二年，胆八大师开西番戒于杭州，移文请师与焉。”黄任本则作：“二十二年腊八，大帅开西番戒于杭州，移文请师与焉。”按：胆八大师，即胆巴大师，为元代藏传佛教著名高僧。“胆”与“腊”因形近而误刻。如此误刻，随处可见。凡此种种，均可看出元贤所编的《鼓山志》不仅属于珍稀的善本古籍，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（责任编辑 黄夏年）

^① 元贤《鼓山志》卷5，第2册，第12页。